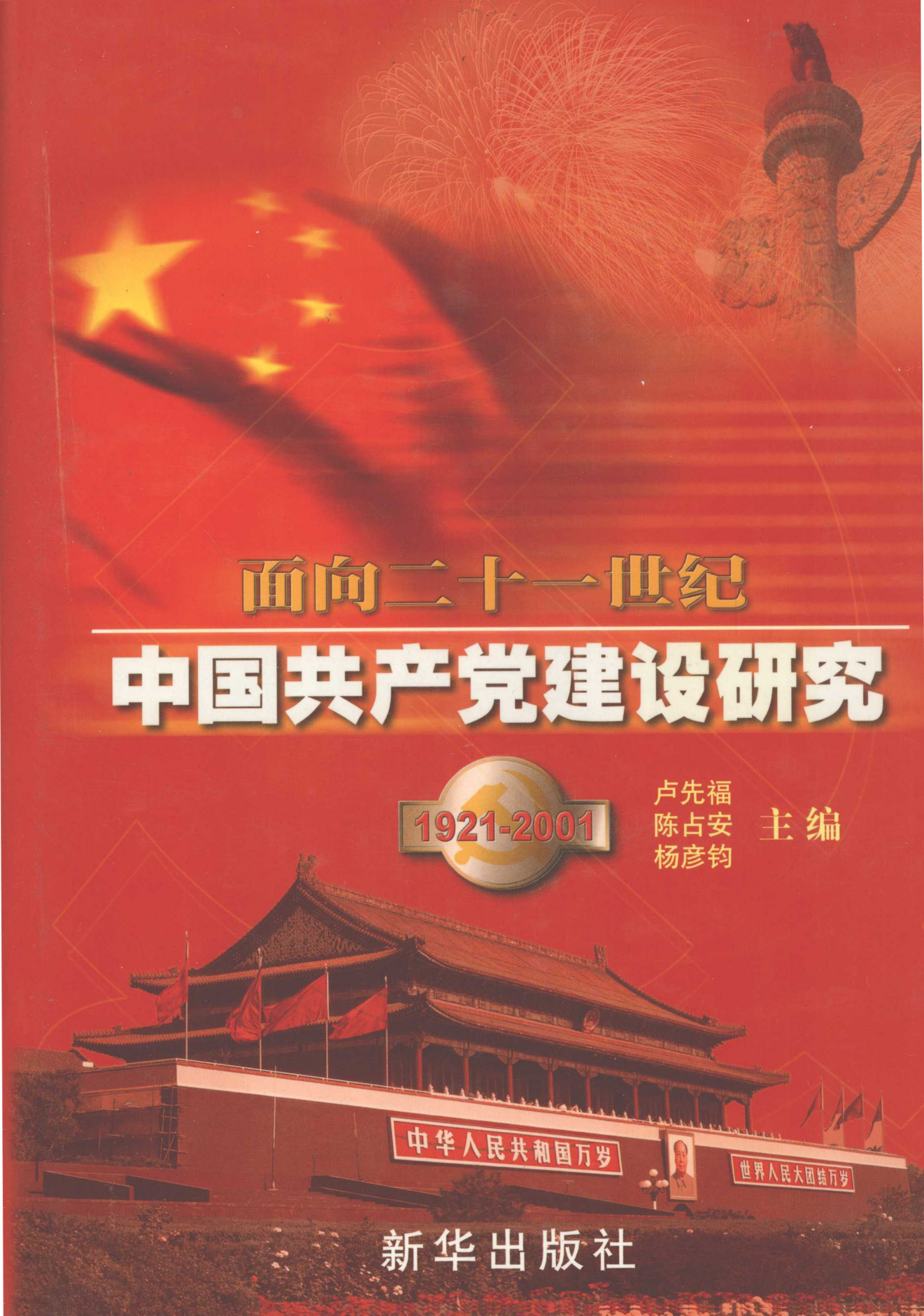




面向二十一世纪 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



卢先福
陈占安
杨彦钧

主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新华出版社

面向 21 世纪 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

下 册

卢先福
陈占安
杨彦钧

主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向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卢先福, 陈占安, 杨彦钧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11-5337-X

I. 面… II. ①卢… ②陈… ③杨… III. 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建设—研究 IV. 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983 号

面向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

主编 卢先福 陈占安 杨彦钧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腾飞胶印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135 印张 3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5011-5337-X/D·856

定价 (上、下册): 690.00 元

第三部分 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陈建坤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民族衰落到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转变中。这一转变又处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科技高新化、产业高级化的大环境中。知识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兴起、初见端倪,这也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巨大影响。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既面临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有明确坚定的战略与对策。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作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道路,这是我国在批判资本主义片面发展、总结以往自身发展经验、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和作出的必然选择。

资本主义国家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 2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他们在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正在向后工业时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充发暴露出他们社会片面发展的两大弊端:一是隐藏在经济奇迹背后的却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人口剧增、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的恶化,这种“高增长、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惨重代价基础之上的。二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导致了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社会犯罪、吸毒、两极分化、黄色文化泛滥,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问题。1968 年,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开始对人类长远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引起了世界性的学术大争论,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二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可持续发展论”,进而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人们在反思资本主义片面发展模式后认识上的新进展。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这样写到:“传统的工业化是不是通往进步的唯一途径?当工业文明陷入它最后痛苦的时刻,去模仿它的工业模式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世界上正飞快地发展着另一种看法: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是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

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国走向更加全面理解社会进步、更加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以至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发生重大失误,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发展生产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甚至把贫穷当成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和反思我国经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

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发展观包含了以下重要观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隔几年要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要分三步走；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同时强调，只有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算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看出，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当代人类全面理解社会进步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辩证性、人民性、进步性和实践性。

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已成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曾谈到：“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以后中共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特别讲到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在确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时又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并在第 9 部分对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了详细阐述。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进一步明确地作出了以下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不断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央先后两次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定，提出了实现国民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并把经济发展同社会全面发展，把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当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实施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大跨世纪战略。联合国环发大会，为了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1994 年我国还率先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规定为党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发展，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已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光明前景。

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三大动力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结构三个层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有何种意识形态。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应体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上。如果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性，仅仅从某一层次甚至某些方面去讲社会发展，那就会导致社会的片面发展。同样，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三大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利用、改造、协调自然，以取得物质资料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力量。纵观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生产性装备日益增多并日益高级化的过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基础，就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不断的智能化。社会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升级换代为形式的不断智能化的规律，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基本规律决定，社会生产力形态，从以手工工具为主的手工生产力阶段，到以普通机器体系为主的机器生产力阶段，再到以智能机器为主的信息（高科技）生产力阶段。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形态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7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更使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江泽民同志最近也指出：“人类文明的进程

越来越深刻地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

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的发展活力来自改革,事业大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来自改革。

第三,精神支柱和共同理想是促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精神,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就失去了灵魂,精神动力源就会枯竭,打不起精神就什么也干不成。正如邓小平所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党的指导思想,又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和伟大旗帜。振兴中华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共同理想和信念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基本内容,就是强调要发挥和运用社会主义的精神优势。江泽民同志以前提出的“创业精神”和今年倡导的“抗洪精神”,就是对邓小平关于发挥社会主义精神优势和政治优势的创造性运用。精神变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就会转化为战胜困难的巨大物质力量。

运用社会系统观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看出:生产力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动力具有最终决定作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力量,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生产力发展时,改革的直接动力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精神动力则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源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天换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从不同侧面为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因此,谋划中国 21 世纪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系统的观点,着眼于全局和长远,要作整体的战略思考。

三、实现中国跨世纪社会发展的若干对策

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三大动力,实现中国跨世纪社会发展应采取如下几点宏观对策:

1. 坚持用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应当看到,科技和教育都存在认识不到位、位置不到位、经费支持不到位、改革力度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发展后劲。所以,只有坚持以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教育干部和群众,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共识,才能把科教兴国的战略变成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

2. 顺应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抓住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发展机遇,坚决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加速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步伐。我国生产力正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期发展水平上,是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消耗和浪费资源的老路,还是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

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高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人类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展示了光明的前景。知识经济本质上是可持续性经济,这就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开了广阔的新途径。高新技术产业是体现技术进步的最好形式,它以先进的技术和持续的创新为基础,将知识迅速转化为产品,代表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改变目前落后现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3. 深化经济、科技、教育、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创造新的体制优势。改革是一个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和适应市场经济的其他配套新体制,任务相当艰巨。以改革为动力,创造体制新优势,为社会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潜力是很大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1999 年经济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了落实这一总的要求,会议还就深化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改革等作出了具体部署。改革已进入深层次,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去夺取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

4. 强化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把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立足点放在人的全面提高上。1994 年《中国 21 世纪议程》白皮书鲜明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重要观点,这充分表明了我国制定的社会全面发展目标是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要赢得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就要重视抓好教育和培训,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充分调动和发挥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出更多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5. 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和融合,依靠“两科”的联盟与融合共同解决现实的社会综合性问题。随着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和经济的一体化、信息化、知识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复杂问题越来越多。诸如,人口和贫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污染和保护、走私与贩毒、战争与冲突、民族问题,空间与海洋开发、公众福利和社会保障、老龄化与健康、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未来的经济体制、不断升级的信息大战、科学技术成就和贫困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局部利益、未来组织机构的变革、贫富极度分化和社会稳定等等。这些日益增多的综合性问题,单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都难以解决,需要开展多学科、跨门类、甚至跨国的综合性研究。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曾谈到:现在提出科教兴国。这里的“科”包括不包括社会科学?当然包括。要使科技关键作用得到发挥,真正重要的是“两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只有“两科”的融合,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综合性问题。目前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体制性障碍使“两科”的联盟和融合难以实现。这种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确实到了非改革不行的时候了,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尽快将其纳入科技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的发展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刊业中心副主任、副编审 张凌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科学地把握它所处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藉以制定的根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既反对了主张先进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也反对了主张毕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立足于这一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对于革命至关重要,同样对于建设也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各国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认识所统治。其源概出于奠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模式的斯大林对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误认。

以斯大林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理论以《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两阶段的设想为根据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把苏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当作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因为《哥达纲领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发展的设想,是根据《资本论》以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典型地点,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性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前提。而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则根本还不具备这个前提。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基本上还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的农业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①。因此,可以说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稿中提出的俄国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是还将“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②。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虽然未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给查苏利奇的那组信稿,但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致的认识:

1. 列宁依据十月革命实践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指出:历史的发展并非只有“西

欧资本主义……这条固定道路”^③，“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④

2. 俄国的苏维埃制度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⑤，因而“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过渡到社会主义”。^⑥

3. “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⑦。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⑧。苏维埃共和国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因此它面临着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任务：“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⑨

斯大林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处历史阶段的误认，其直接原因就是无视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苏联实践中的现实社会主义所作的创造性的探索。

二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理论，纠正了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超越其所处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对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⑩。

这一理论较之列宁对马克思的“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阶段。

2. 其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3. 坚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4. 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5.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6. 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⑪。

这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完全的社会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任务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

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认为，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作一个大致的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阶段；由中等发达水平到资本主义达到的现代化高度发达的水平阶段，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高于资本主义达到的现代化高度发达水平的发展阶段，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也即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

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和交换社会形态理论来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如此三阶段划分的设想是可以成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手工生产力为主、兼有机器生产力向机器生产

力为主、兼有自动化机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即机器生产力为主、兼有自动化机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向自动化机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自动化机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即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产品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理论上科学地反驳了那种以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但这是它的高级阶段——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尚是初级阶段,它尚处于与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发达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建立有两种基础、两种前提:一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完全的社会主义取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代虽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社会总体结构仍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的农业社会。不能以前一种“取代”的公式去套后一种“取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反对了那种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机械论,也反对了以为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可以径由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直接进入产品经济阶段的空想论。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解决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水平的前提的话,那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进一步解决了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这个前提后,如何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向具有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途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作出了独特的探索。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00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451页
- ③④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336、142页
- ⑤《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
- ⑥《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5—217页
- ⑦《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2页
- ⑨《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 ⑩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373页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中共山东泰安师范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 王新华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理解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是至关重要的。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把握

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同主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首次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毛泽东也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论述,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产生的历史的渊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前苏联和东欧长期超初级阶段运行,结果社会主义事业萎靡滑坡,直到解体剧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再悖离初级阶段的国情,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出现了文革十年动乱,使社会主义裹步不前,人们生活水平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正处在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党在十三大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强调我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其内涵包括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主义,其二是初级阶段。它既明确肯定了我国已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不允许后退;又指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水平,我们决不能干超越阶段的事,而是要老老实实地长期地艰苦创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

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然带有明显的两重性。第一,从生产力的状况看。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我国已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有不少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经济成分,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物质技术基础还很落后,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都还很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生产力整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这种生产力结构的多层次和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比较低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也正是决定我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

第二,从生产关系的状况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剥削阶段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原则已成为我国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其必然具有内在的不完善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公有制经济虽然已占据主体地位,但还存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其次,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相适应,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也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存在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这种状态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又要允许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三,从上层建筑的状况看。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在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够完善,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都还不高,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以及各种腐败现象还严重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是十分复杂的、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实现。

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重要。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只讲性质和方向,不讲程度和水平,常常会使我们陷于盲目状态,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和损失。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扎扎实实地前进,要防止过去那种超越阶段的思想和做法以其它形态出现。

三、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基本国情,是最大的实际。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和模糊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脚踏实地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首先,必须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重要矛盾

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结束,只要这个矛盾尚未解决,我们决不能动摇这个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科学认识。

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很多,有的还比较突出。如国企改革和职工下岗问题、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可谓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都是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造成的。只要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就可以看清楚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实质,从而找到最重要、最基本的解决方法。

其次,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它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这是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运动规律的反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是我们党最可靠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年初南巡谈话中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这既有当时的针对性,又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起时伏的“左”右倾思想影响,不断干扰和破坏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要不断地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解,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第三,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五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任务,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纲领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我们要把基本纲领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把握,全面贯彻。

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以一蹴而就,只能按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与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在近期,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并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各个方面互相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论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四川大学政教系副主任、副教授 杨争光

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来日渐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尚的热门话题。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伴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它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历史过程。但它不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也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均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本文仅就全球化浪潮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作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社会主义必须融入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概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开端却要悠久得多。全球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全球化浪潮迅速扩展到全球。对此,马克思早有精辟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的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①因此,全球化趋势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全球化进程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行为主体。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独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那就大错特错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纷纷解体,人们不断地探讨其根源。应该说促使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内外因素是很多的,十分复杂。但将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来考虑,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是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时代表现出开放的、多维度、多元化的特征,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却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一元中心的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过昔日的辉煌。解体前的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昔日的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具有雄厚实力,能与美国抗衡的第二超级大国;而其他的东欧国家“与大多数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比较,东欧各国经济在提高增长率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培养或扩大了熟练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劳动力,解决了失业问题,并且至少使本国大多数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有了保障。”^②尤其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 1929 年~1933 年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却一枝独秀地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致使一贯对社会主义抱敌视态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抛弃“前嫌”,吸收了某些原本认为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如,名噪一时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借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为多数人称道的福利国家制度更是基于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理念。但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却被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不得不令人深思。西方学者尤·克拉章博士认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是因为昨天的社会主义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理论痕迹,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古典工业主义的特征已被“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所取代。因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接受全球化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僵化的、自命为中心的、妄图实现对外输出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全球化所追求的开放的、多元的、多维度是根本悖离的。在全球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前,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同其他制度相互借鉴、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创新。时代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改革自身,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求得生存、发展。如前所述,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借鉴,吸收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尽管这种变革的动因来自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资本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批评并且向它学习”(Carlos Fuentes)。相比之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热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在实践方面则实行“两个

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封闭政策。在拒绝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与西方进行资金、技术交流的渠道也因种种原因处于堵塞状态。这对于经济建设起点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大大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有非常沉痛的教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基本上过于“边缘化”状态,由于独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造成了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虽然我们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1978 年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主动地加入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全球化最好的回应。改革开放使中国深入、全面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又使世界了解、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知识及创新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的历程,也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作为一种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回避、甚至抵抗的态度都不是明智之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面对、主动参与。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指出:“阻止全球化无异想阻止地球自转”。明智的做法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联系”。^③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二、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历史机遇。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全球化的进程与影响,全球化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后,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而工业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化能迅速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全球化引进最稀有的资本和技术,并与该国最富有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找到一条捷径。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必然出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升级;另一种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即发达国家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这一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引进资本、技术、加快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从战后来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大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致力于利用科技新成果发展收益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就较好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建立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工业,进入国际市场,迅速扩大了出口贸易,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积累。第二次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两次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使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又再一次调整产业结构,把一部分大量消耗能源和矿产资源、污染环境较为

严重的重化工业部门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韩国和台湾又抓住时机发展了汽车、造船、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产业转移高潮,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它们再一次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上,除继续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并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转移仍然方兴未艾,愈演愈烈,促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25%,上升到1992年的32%,1996年达37%。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战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事资本积累的国家。据世界银行1996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最新研究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密切相联。比较典型的是东南亚,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它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较早地踏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有资料显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作为亚洲开放较早的国家,积极利用外资,在其实施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巨额的外资注入,也就没有今日韩国的经济成就。韩国是以借款方式利用外资较成功的国家。从1962~1991年,韩国共引进外国资金867.36亿美元,其中借款额达797.0亿美元,约占91.9%。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明显提高了韩国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据统计,“一五”时期的投资率由6.1%提高到15.1%，“二五”时期由13.1%提高到26.4%，“三五”时期由18.2%提高到27.8%，“四五”时期由23.9%提高到35.5%。迅速提高的投资率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62~1982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2%,其中,靠外资实现的增长达40%,20世纪70年代甚至超过50%。此外,外资的引进对于带动韩国的出口加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基于工业的建设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同样是通过开放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据统计,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印尼8%,泰国7.2%,马来西亚7.4%,新加坡10.1%。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其增长速度仍高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80~1987年,印尼3.6%,泰国5.6%,马来西亚4.5%,新加坡5.4%。

巴西,也是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国内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194.5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2992.3亿美元,共增加14倍。巴西国内有关人士认为,巴西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利用外资,他们认为,如果不利用外资,每年只能增长4%~5%,而利用外资,每年可多增长2.5~3%。

总之,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已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逐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为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对此,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只有“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了发燕尾服过程的道路。”^①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发展支点,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尤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

险。对此,我们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是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因此,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种种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动荡、失衡和危机。近年来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有风险的。既然是风险,就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而且难以防范。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将要面临的风险远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其道理很简单,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历经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股市动荡、内幕交易、腐败、欺诈,等等考验,早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和极强的“免疫力”。更重要的是,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经济的锤炼,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而这一切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表现在较低的国民收入,短缺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还反映在市场制度的落后,正是这种制度方面的欠缺,使发展中国家在无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但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它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事,也不可能再花上数百年去建成较为成熟的、能与当代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然后再对外开放。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国内短缺的资本、技术等,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为了与国际接轨,在短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发达国家目前所有的市场形式、机制、制度,但由于这种“拿来”的东西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及制度保障,并与国内现存的体制、制度存在互不协调、脱节等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制度是极不成熟的,甚至是“夹生的”。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能给发展中国家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却不能同样快速地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等等。这就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选择:落后的现实要求它们尽可能地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不健全的国内体制、制度又极端脆弱,缺乏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既要尽可能地实行开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又要兼顾国内体制的承载能力,尽量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开放程度应与其市场化程度,体制、制度的完善成正比,因此,开放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来不及等到市场成熟,体制、制度完善就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与市场制度趋于完善、富有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危机、风险大部分将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近年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东南亚国家多为经济外向型国家,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国内制度的不完善又很容易被国际投资者所利用。即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制度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投机家造成的。但这仅仅是外部原因,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内部条件,就不足以诱发现实的危机。虽然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绩骄人,但也潜伏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国内金融机构不健全,银行不良资产多等等。有资料显示,韩国、泰国在金融危机暴发前,银行总资产中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已分别高达 14% 和 18%,预计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其比例将超过 25%,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4% 和 40%。此外,金融监管不力、监督法规不健全等等,均表现出东南亚金融制度的脆弱性。但与此同时,在国内金融制度存在种种隐患和弱点的情况下,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即参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但最终危机是发生在东南亚而不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虽然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较强。事实上,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